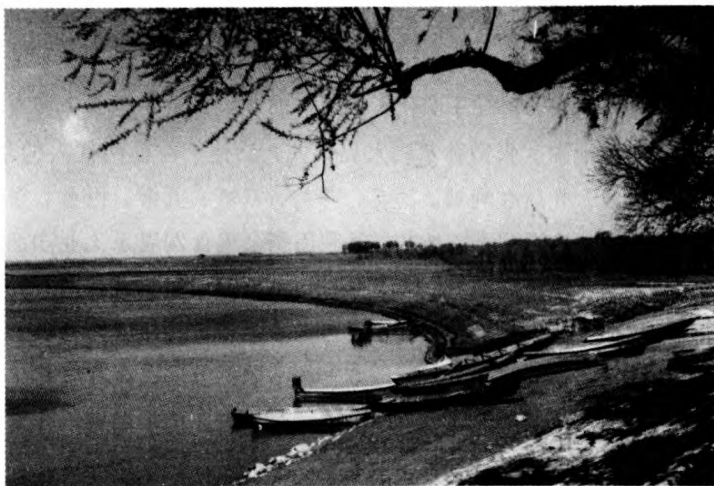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呼兰河与后花园

### 家族沿革

20 世纪初的呼兰，是位于松花江北岸的一座较为开化的小城。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绕城而过，小城因此得名。呼兰遍地沃野、交通便利，距素有“东方小巴黎”之誉的北方名城哈尔滨约 30 公里。呼兰河给这座位于北方内陆的小城带来了灵气与诗意，更孕育了萧红这呼兰河的女儿，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她奉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传世之作。乡土因人物、因文字而闻名。今天，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稍有常识者来说，呼兰河已经和萧红紧紧连在一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条河亦几乎成了萧红热爱者们的一处精神故乡，一个心理情结，承载着人们太多关于萧红的想象。众所周知，萧红生前与其家族处于尖锐对立



今天的呼兰河（王连喜摄）

的两极，家族是她最不愿言说的话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张氏家族在黑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历史稍作钩沉。

满清王朝视黑龙江流域为“龙兴之地”，为了保持固有风俗习惯、独占东北特产，维护满洲八旗的生计，自康熙七年（1668）开始对东北实行了将近200年的封禁政策。在此期间，关内特别是河北、山东等地的破产农民纷纷“闯关东”谋生路，在广袤的黑土地上淘金、伐木、垦荒，在求生之余冀望实现他们那创业兴家的光荣与梦想。据修撰于1935年8月的《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萧红祖籍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今属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先祖张岱于清乾隆年间携妻章氏逃荒关东。当时，山东灾荒不断，土地兼并剧烈，大量土地被清王室征作封地，致使农民大量破产，衣食无着。为求生存，一些破产农民不顾满清王朝禁令，经不同口岸纷纷逃往东北，一副挑担往往便是逃荒者的全部家当。当年“担着担子逃荒”的张岱夫妇自然不会想到，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会在这片异乡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家族，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萧红是张氏家族在关东的第六代传人。

张岱夫妇逃荒关东后，起初在辽宁朝阳、凤凰城等地给旗户地主当雇工，后迁至吉林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今属榆树县，距城东90里），报领了一块明末遗民开垦过的撂荒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从此定居下来，但张岱夫妇的创业梦想并没有就此停止。嘉庆年间，张岱支持长子张明福、次子张明贵北上创业到黑龙江阿城县开荒种地，阿城后来成为张氏家族的主要栖息地。同治六年，张岱和三子张明义也来到黑龙江宾县猴石占地开荒。肥沃的黑土很快让张家富裕起来，经父子两代人的艰苦创业，张家发展成为拥有土地数百晌的新兴汉族大地主。张岱孙辈同宗兄弟九人，他们在前两代人的基础上，更是拼力发展家业，先后在阿城、宾县、呼兰、双城、五常、巴彦、绥化、克山、兰西、明水等地广置房产、地产，并利用剩余粮食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从此，张氏家族亦农、亦工、亦商，一方面将粮食外销辽宁、吉林两省，另一方面开办油坊、酒厂，开设杂货铺、钱庄、当铺。不多久，便成为吉林、黑龙江两省最大的地主之一。其势之众，连地方官都不敢招惹。甚至有些村屯因张家杂货铺、油坊、酒厂的名号而得名。阿城“福昌号屯”的地名就因张家杂货铺商号“福昌恒”和烧锅“福昌明”而得名，足见其富甲一方之盛况。张氏家族传至第四代，即萧红祖父一代，家道开始中落。随着家业渐渐衰败，这个庞大的家族亦开始慢慢离析、瓦解。光绪初年，萧红祖父分得位于呼兰的40多

购土地、30多间房屋和一座烧锅（酒厂），随即搬离阿城福昌号，在呼兰另立门户。

萧红祖父张维祯（1849—1929）性情温厚，甚至有些懦弱，幼读诗书十余年，辍学时恰逢家业鼎盛之际，于是“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但他心地善良，生性懒散，对经商务农没有什么兴趣，后来一直赋闲在家，娶妻生女后更是整天和老婆孩子在一起消磨时光，享受天伦之乐。读读诗书、写写大字是其闲暇之余唯一的爱好，对于经营家业全然不放在心上。张维祯中年分家到呼兰不久，父母双双过世，因不谙经营家业，屡被伙计们拐骗坑害，当铺、油坊、酒厂先后倒闭。最后，他就死守着几十垧土地和房屋，靠收租过日子。萧红祖母范氏（1845—1917）精明强干，办事果断，喜欢热闹，到呼兰后一切家务都由她打理。然而，在当时女人的活动空间毕竟有限，即便精明果敢，亦终难以挽回家业迅速衰败的颓势。张维祯和范氏生有三女一子，幼子不幸夭亡，膝下无子成了他们的最大心病。随着三个女儿相继出嫁，老两口益觉孤单寂寞，老来无着，便考虑在族中过继一个男孩作为继子，以备养老。他们最终选中堂弟张维岳（在张家大排行中，张维祯排行第四，张维岳排行第五）与病逝前妻的第三子张廷举。他就是萧红的生父。

张廷举（1888—1959）3岁丧母，12岁过继给四伯父张维祯为嗣，继父给他改字“选三”，意指在堂弟张维岳的儿子中，选中老三为继子之意。张廷举随继父来呼兰之前，在阿城县里上小学，到呼兰后继母范氏认为读书无用，枉费钱财，想让他辍学学习务农经商，早点理财管家，但他执意不肯。张维祯不忍违拗其意愿，就送至省城卜奎（即今齐齐哈尔市）继续深造。1906年，张廷举毕业于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堂，因考试成绩优异，奖励廪生，尔后进入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时获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时年21岁。后到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兼任该县实业局劝业员。婚后，张廷举辞去汤原县公职回归故里，任呼兰县农工学堂教员兼改良私塾总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张廷举受时代感召，思想比较激进，成为呼兰县著名的革新人物，出任过小学校长、通俗出版社社长、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县教育局局长等职。后因萧红婚变出走北京，他受舆论压力辞去呼兰县教育局局长一职，到巴彦县任县教育局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九一八”事变之初，张廷举在齐齐哈尔出任伪黑龙江省教育局秘书，后又回呼兰任伪呼兰县日满协和会副会长，“九三”抗战后再



萧红父亲张廷举（1888—1959）

（张抗提供）

未工作，日本投降后又充当过呼兰县维持会副会长。土改运动中，张廷举因积极拥护人民政府和土改政策，支持儿女参军，被呼兰县人民政府确认为开明绅士，一度被选为松江省参议员，并于1946年4月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参加了在宾县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大会。

萧红生母姜玉兰（1886—1919）是呼兰县北姜家窝堡地主姜文选的大女儿。姜文选年轻时聪敏好学，两度赴吉林参加科举考试不中。后无心猎取功名便在家里设馆授徒，当地人视之为博学之士，名望很高，呼兰、巴彦两县的学生大多就读其门下。在当地，姜家属殷实大户，拥有土地220多垧，姜文选本人曾被选为黑龙江省议员。《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姜玉兰“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据姜玉兰三妹姜玉凤在20世纪80年代初回忆，姐姐除操持一般家务外还会打算盘。由此看来，萧红生母在当时农家姑娘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姜家四姐妹中，父亲尤其看重大女儿姜玉兰，一心一意想开门好亲，直到二女儿姜玉环出嫁了，还未给大女儿选中满意的对象。



萧红生母姜玉兰（1886—1919）

（张抗提供）

姜家选中张廷举做大女婿较有戏剧性。在呼兰县城做买卖的范老万与张廷举继母范氏认户为一家子，而范妻是西营子宋六的姐姐。1908年正月，宋六儿子娶媳妇，范氏来屯里喝喜酒相中了姜玉兰，求宋六、范老万做媒人到姜家提亲。不久，姜玉兰的父亲和姑夫中医傅八先生进城到张家相看，张廷举当时在省城卜奎，只看了相片两家便把亲事定了下来。按照风俗，张家派张廷举的亲二

哥张廷选跟随媒人宋六到姜家过礼，送去裹脚布和装烟钱。张姜两家联姻，双方都极为满意。1909年8月，张廷举、姜玉兰择定吉日完婚。给众亲友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婚宴的豪华与排场外，更有当日那场大雨。姜玉兰在张家生有一女三子，分别是荣华即萧红、富贵、连贵即张秀珂（1916—1956）、连富，其中富贵、连富先后夭折。

## 身世之“谜”

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萧红出生于呼兰城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

20世纪80年代初，萧军之女萧耘女士在访谈萧红生前好友李洁吾时，听他谈到萧红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不轻易谈笑，不轻易谈自己，也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这种性格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别人对这位命运多舛的女作家的了解，甚至，最简单的身世信息亦变得扑朔迷离，比如生日。30年代，萧红因与家族关系彻底破裂，父亲与之脱离父女关系并将其开除族籍，因而，在《东昌张氏宗谱书》里对她不作记载，在姜玉兰条目下只载有“生三子”而不是“一女三子”。关于一个人生日最权威的认定，莫过于父母，但父母对此不予言说，因而到底生在哪天，就成为萧红的第一个未解之谜。而在其31年的生命历程中，像这样似乎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往后还有很多。或许这就是萧红的特殊之处——她生前实在被人了解得太少。

关于萧红的生日有很多种说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两种：其一是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当地称“五月节”），其二是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亦有人撰文说是1911年6月2日，但把这天认为是五月初五，这显然是错误的，从万年历可以推知1911年的端午节是6月1日。然而，在端午节和6月2日之间，更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折中说法，那就是萧红实际生于端午节，但呼兰本地风俗认为端午节出生的孩子不吉利，因而就“往后串一天”，即五月初六，也就是6月2日。“端午节生孩子不吉利”之说，最早或许见于姜德明1978年8月在《新文学史料》第四辑上发表的《鲁迅与萧红》一文，文中强调：“她（萧红）一生长下来便受到家人的诅咒，因为按照旧时迷信的说法，端午节生下的孩子是不吉祥的。因此，萧红连生日的自由都没有，她从小就被人们指定推迟三天出世，硬说生日是五月初八。”此说虽全然拿不出任何

证据，但影响甚大，得到很多人的呼应。很显然，这也成了萧红自一出生便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有力证据之一。

也就是说，萧红的生日有一个公开的日子，亦即规避不吉利的日子，普遍认为是端午节的后一天；实际上她生于端午节，只是因为忌讳而成了不能公开的“秘密”。然而，呼兰本地学者王化钰撰文认为，在呼兰从未有端午节生孩子不吉利的说法。或许，在潜意识里，人们为萧红生于五月节而在不经意地寻找合理的说法。这更透露出萧红应该生于五月节的后一天。近年，关于“不吉利”又另有说法。曹革成在2005年出版的《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援引萧红小姨梁静芝的回忆说：“在当时呼兰的老人们中有传说，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说是女孩五月初五出生，很不吉利，所以萧红家人就说她是五月初六出生的。”出生于五月节，或许在呼兰当地人看来，真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诞生，亦似乎暗示萧红一出生就如此不平凡，因而，衍生出种种说法就不足为奇。现在，已成为一个政府机构的萧红故居，为了每年端午节名正言顺地在呼兰举办“端午诗会”，在各种宣传资料上将萧红生日硬性定在农历五月初五。事实上，萧红生日成了一个无从查考的谜。但是，仔细排比以上两种说法，铁峰等研究者所认定的五月初六，即1911年6月2日，笔者认为更为可信。据铁峰《萧红生平事迹考》记载，他曾经寻访到张廷举的老朋友于兴阁，于老先生谈及数月前曾听张廷举亲口说萧红是宣统三年五月初六生人。后来铁峰就此又找跟萧红关系最好的堂妹张秀珉核实，“她也恍惚记得是五月节的后一天，但不敢说准”。

自张岱夫妇逃荒关东百余年后，张氏家族后人散居黑龙江各地，为了祭祖和便于后人联系，从第四代开始确定了张氏族谱，即从萧红祖父起，张家后人按照一首诗的字序排辈分、起名字。那首规约张氏族人名字的诗是：“维廷秀福荫，麟凤玉芝华。道成文宪立，德树万世佳。”按照这首诗的规定，萧红祖父范“维”字，起名张维祯；萧红父范“廷”字，起名张廷举，到萧红这一代范“秀”字，起名张秀环，而且这一代人名字的第三字都带有“王”字旁，如张秀珂、张秀琢、张秀珉，等等。除“张秀环”这个正式的大名外，祖父又给萧红起了乳名“荣华”，寓有荣华富贵之意，萧红夭亡大弟乳名“富贵”。

6岁那年，母亲带小荣华回娘家省亲，适逢妹妹姜玉环也在家，当她得知外甥女的大名是“张秀环”时，这位二姨说什么也不干，执意要姐姐给萧红改名。按照东北民间风俗，不同辈分的人，名字不能同字，碰到一起就是犯忌讳，“张

秀环”和“姜玉环”犯了“环”字之忌。姜玉兰于是让父亲给萧红改名“张乃莹”。这个名字虽然脱开了张氏族谱的规约，但毕竟是硕学的外祖父所赐，得到了张家人的认可。当然，也可能因为是女孩的缘故，名字的家族特征没有男孩那样重要。“张乃莹”这三个字放在“秀”字辈兄弟姐妹中，可明显看出原名遭改而又有所保留的痕迹：乃，是秀的下半部；环，可释为“带孔之玉”，《论语》中有“如玉之莹”之句。看来，“乃莹”二字在改动中分别保有原名一半的字形和全部的意义，足见饱学的外祖父在给张秀环重新命名时的精巧心智。

童稚的张秀环自然不会想到名字的修改，似乎已然宿命般暗示着在这个家族中她将会成为一个异类。在张氏家族第六代齐整的名字行列中，“张乃莹”显得那么特别。联想到张秀环后来的命运，这是否是一个天意的巧合？这个从此名叫张乃莹的小女孩，自然更想不到18年后她的家族连这部分保留了家族特征的“张乃莹”，也要从家族谱系中彻底剔除。从由家族给予名字，到名字的家族特征被部分修改，再到名字被家族刻意忘记，张秀环的命运似乎全息浓缩在这个关于名字的带有宿命意味的故事里。“张乃莹”这个名字伴随着她从小学到中学的求学历程，后来渐渐被“萧红”这个女孩的自我命名所代替，世人其后只知写《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萧红”，鲜有人知其原名“张乃莹”，更遑论“张秀环”。

1978年8、9月间，萧军对自己所保存的一批萧红书简进行整理辑存，并对每封信加以注释。在注释过程中，这批萧红原信连带萧军的注释在《新文学史料》上陆续刊出。9月1日，萧军在给萧红的第13封信做注释时谈到萧红的弟弟张秀珂曾经疑心张廷举并不是他和姐姐的亲生父亲，而他们的生父是张家的一个地户。萧红母亲与雇主张廷举有了性关系后，伙同张廷举谋害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带着萧红和张秀珂来到张家，并改姓张。当时，人们慑于张家势力不敢追查这桩“害夫霸妻”的公案。张秀珂于20世纪40年代东北土改期间告诉萧军他的怀疑，事隔三十多年，萧军对这一问题“考证了又考证”，最后认定其所疑之事是“可能的”。接着，萧军又言之凿凿地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为根据”，那便是在30年代初，萧红曾经向他谈及其作为地主的父亲对地户的残忍、伪善，以至“所表现的近于兽类的、乱伦的行径”。萧红所提供的素材，被萧军写进了1933年在《国际协报》上连载的小说《涓涓》。然而，在这次旧事重提中，萧军十分确定地说：“从她述说她父亲张选三对于她曾经表现出企图乱

伦的丑恶行径，这可证明后来张秀珂疑心张选三不是他们的生父——也可能就是谋害他们亲父的仇人——是有根据的。”

萧军这段文字无疑传出关于萧红身世的巨大秘密。文章在《新文学史料》第3辑（1979年5月）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萧红父亲“霸妻害夫”、“奸女乱伦”的恶行、恶德自然是极其吸引眼球的话题。此说一出令海内外对萧红有所关注的人士大为震惊，特别是在萧红的家乡呼兰。萧军的说法马上得到了陈隄、蒋锡金、方未艾等人的响应和支持，纷纷撰文强化，并从不同侧面有所补充，使其更为完善可信。其间，萧红异母弟张秀琰在《海燕》1979年第5期上撰文《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指出：“关于姐姐的身世，报刊上有的说她原来可能不姓张，他和弟弟是随着母亲一起到张家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还有的说，萧红的父亲对萧红的母亲系属逼婚，这就更荒谬可笑了。”但这种声音在当时显得十分微弱，少有人关注。

80年代初，萧红渐渐为学界关注，并形成一股热潮，关于其身世的“养女说”随之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势下，新编《呼兰县志》的编撰者们为了把关于萧红的准确信息写进地方志进行了大面积走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们先后在呼兰、阿城、哈尔滨、大连、北京等地遍访萧红亲属，如萧红生母姜玉兰三妹姜玉凤（时年93岁）、萧红生母堂妹姜玉坤（时年84岁）、萧红继母梁亚兰的亲妹妹梁静芝（时年71岁）、萧红堂妹张秀珉（时年71岁）、萧红亲弟媳李性菊，等等。此外，还调查了当年在呼兰、阿城张家干活的长工以及一些当年的街坊邻居。姜玉凤、姜玉坤详细描述了当年张廷举和姜玉兰订婚、结婚的全过程；而当年在张家干活的长工们则表示从未听说过张家三掌柜的“霸妻害夫”之事。大量人证、物证无可辩驳地表明萧红是张廷举养女一说，纯属子虚乌有。

其实，从情理上推断，这一说法亦不攻自破。前文说过，姜家在当地是富裕殷实的大地主，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一个无田无地的佃户。更重要的是，1947年东北的土改运动可谓“暴风骤雨”，当时，“左”倾路线使斗争扩大化，在农村“扫堂子”，斗争对象扩大到中农，在城市触及到90%以上的中小工商业者。福昌号屯张家老七张廷勋仅仅因为不务正业在土改斗争中被群众打死。张廷举果有“霸妻害夫”的恶行和“奸女乱伦”的恶德，即便事发当时人们慑于其势不敢声张，毫无疑问他也无法躲过土改这一关。然而，80年代初据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员回忆，1946年在呼兰进行的砍挖斗争中，因张廷举是呼兰教育界知名

人士，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其本人没有罪恶，更无民愤，被定为地方开明绅士。

然而，萧军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张秀珂的确向他表达过对生父的疑心。张秀珂之子张抗在《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5辑（1982年8月）上发表《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一文，对其父从疑心产生到自我消释的经过进行了详细描述，资料翔实、态度公允，令人十分信服。实际上，张秀珂疑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家庭琐屑，他也认为父亲张廷举和萧红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不是什么血缘关系不同之故，而是萧红的思想与行为超越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极限范围”。

在众多有关萧红的传记和评传中，鲜有对这段身世之“谜”的叙述，或许在很多作者和研究者看来，这段公案情理荒谬，不值一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身世之“谜”的出现却并非偶然，它其实基于人们一直以来关于萧红的整体性认知。在对萧红的认知上，一直存有一个莫大的误区，那就是将其悲剧性命运仅仅归结为社会、他人对她的压制和迫害，很少考虑其个人性格因素的作用。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还只是简单地将萧红看作一个饱受不公，被侮辱、被损害，令人同情的弱女子。这其中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此，恰恰是对其丰富内心的莫大遮蔽，也是对她这样一个如此丰富的现代女性形象的简单化。人们往往在想象中赋予她一些苦难，或片面夸大苦难。而这种言过其实的苦难又几乎无一不是归结为阶级对立，萧红个人对于命运的抗争自然演化为阶级反抗。在一次次被叙述中，其本来面目渐渐模糊。萧红的诞生和弃世离我们如此之近，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却对她一无所知，或者说知之甚少，未知太多，但我们又自认为已经了解很多。在本书后边的叙述中，还有一些“谜”在等着我们。

这份身世之“谜”的公案固然近乎荒谬，但它何以产生却是我们重新面对萧红应该深长思之的问题。基于特定时代的观念，在某些人的潜意识里，似乎本能地想让萧红彻底摆脱地主女儿的身份。或许，在他们看来，对家庭的反抗、出走还不足以彰显女作家的光辉形象，萧红应该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雇农的女儿才更合乎逻辑。因为，在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倡导中，出身或身份已然潜移默化地成了一些人的思维定式。面对他们的“善意”想象，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但在萧红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今天，我们想了解一个真实的萧红。虽然真实只是一种不可及的理想，但对于一个传记作者来说，还是应该尽力穷究，以便无限接近。



萧红故居（王连喜摄于20世纪90年代）

## 童年记忆

张家大院坐落在呼兰城南关的龙王庙路南。这座典型明清风格的北方院落建造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张廷举、姜玉兰完婚时，工程尚未完全竣工。整座宅院占地七千多平方米，共有房舍三十余间，分东、西两部分。西院是张家的库房和佃户居住的地方，后来出租给一些做小生意的穷人。张家人自己居住的东院有五间正房，外加三间东厢房，正房后面是一个近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五间正房为青砖青瓦土木结构，正中一间是厨房，前后门进出。前门是两扇对开格式的苏州门，但已明显呈现出北方风格；后门为对开的北方式木制门。萧红祖父母住在两间西屋，两间东屋则是她父母的居所，她就出生在东边第一间的炕头上。整座院落透露出晚清北方小康之家的气派，殷实、安宁而富足。

偌大院落在萧红出生之前，常年在家的只有年迈的祖父、祖母和母亲，因工作的缘故父亲常不在家。张廷举和姜玉兰婚后三年才有孩子，自然让他们对萧红的出世寄予了莫大期望，当发现生下的是女孩时，当时那份失望亦可想见。就张维桢这一张氏支脉来说，太久没有出现男孩了。因此，萧红的出世令老祖母尤为失望，但对于长期赋闲在家、懒散而寂寞的祖父来说，还是喜出望外。此前，他的落寞或许源于与继子不可能有太多的交流，以及因不会理财动辄挨

范氏“死脑瓜骨”的数落和埋怨，五月节后降生的长孙女即将改变他的生活。萧红的桀骜与倔强似乎在出生不久就有所表现，睡前母亲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使其安睡，她往往拼命挣扎不让人抓住胳膊。一次，前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种情形，笑着说：“这小丫头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子’。”在亲友印象中，萧红的倔强几近天生。

祖父和后花园几乎是萧红童年记忆的全部。两岁时大弟富贵出生，这座庞大的宅院终于有了男孩，自然成了全家关注的重心，父母已不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她身上，这也许是萧红更多的时候是和祖父在一起的客观原因。当然，祖父也实在太疼爱她，以致让初步拥有记忆的小女孩认为“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而正因为有了祖父也让她觉得即便家里有了小弟弟，也没什么影响，“不过那时他才一岁半岁的，所以不算他”。



萧红故居后花园（程乾波摄）

小女孩的童年记忆从后花园开始。祖父在后花园里干什么她也学着干什么，栽花、拔草、锄地。下种的时候即便把种子都踢飞了，祖父也不会说什么；除草时把苗除掉，把狗尾巴草留下，祖父不仅不恼，还耐心地讲解狗尾巴草和谷子的区别。祖父和后花园给了幼年萧红一个自由无虑的特定时空，她以自由而任性的眼光看待里边的一切。那些美好的童年经验后来被定格在《呼兰河传》里：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象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每当祖母数落祖父“懒”或“死脑瓜骨”的时候，小女孩便拉着祖父的手，在祖母那“小死脑瓜骨”的温情数落中进入后花园。后花园地面的宽旷、天空的高远和颜色的鲜绿亮丽，给了这一老一小永远的好心情。因为萧红，老祖父的寂寞得到了最大的消释。就这样，萧红一天天度过童年，正如她在弃世前对呼兰河进行精神返回时所感慨的那样：“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祖父毕竟老迈，他慈祥的面容、温和的性情在让萧红感受到爱与温暖还有自由无虑的同时，也让她在娇惯中一天天长大，顽皮而任性。5月，园里的玫瑰花茂盛开放，趁祖父在拔草，萧红在他的帽子上插上二三十朵玫瑰花，不知情的祖父戴着这样的“花冠”回到屋内，感慨今春雨水好，院子里的玫瑰树开花才那么香，随处都可以闻到。等他把帽子摘下来，才知道花香并非今春雨水好，而是玫瑰花就在头上。萧红的顽皮给祖父、祖母还有她自己带来了无边的快乐。邻居家掉进井里的小猪和鸭子被祖父要来用黄泥裹着烤熟了给她吃，有了如此美味的经验，她便故意把鸭子往井里赶，而且坚决要吃掉井里的鸭子。小女孩的任性几乎让祖父奈何不得。

3岁时，祖母给予的疼痛始终横亘在萧红的记忆里。祖母屋内白净的窗纸激发了她的破坏欲，只要一爬上炕便往里边跑去，然后用小手指把窗纸按着窗棂一格一格捅破，听着悦耳的嘭嘭声，便更得意于自己的破坏。不忍呵骂的祖母无法制止她这小小的“恶行”，有一次等她上炕后便拿根大针等在窗纸后边。当破坏的小手指碰到针尖之后，小女孩马上明白是“祖母用针刺我”。横亘于童年记忆里的疼痛，让萧红始终不喜欢祖母，觉得祖母不爱她，在小女孩看来，拿针刺她的祖母是恶毒的。许多研究者不加分析地据此也把祖母的虐待看作萧红

的童年苦难之一，恰恰忘掉了那只是一个一直受宠爱的小女孩的童年经验。据萧红亲属回忆，祖母其实同样非常爱她，只是因为祖父的近乎溺爱，而衬托出周围所有人似乎都对她“不太爱”。

哈尔滨的萧红研究者铁峰先生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一书中亦认为，祖母此举正好说明对萧红的娇惯和溺爱。新中国成立前的东北农村相当贫困，20世纪初叶，在像呼兰这样的小城里，除非官宦人家才有全部镶玻璃的窗子，就是那些富商人家也只是使用特制的窗纸裱糊窗户。那种用烂麻制作、又黑又厚的窗纸，富裕而讲究的人家一两年才换一次，普通人家十年八年也换不起，只是哪里破了哪里补上，像穷人的衣服一样破烂。萧红祖母裱窗的白纸当时比较贵重，涂上油之后既防雨又透亮，非上等人家不用。而拿针刺一下手指，也是东北老太太用来吓唬心爱的孩子让他不去捅窗纸的办法，在当时近乎一种民俗，就像吓唬夜哭的孩子谎称“狼来了”一样。张秀琢亦曾专就祖母针刺萧红这件事问过其父，张廷举笑着回答说：“哪能真用针扎她，奶奶看她用手指头捅窗户纸，就在她的对面拿针比划着，她就记住了，多少天不理奶奶。”

萧红有记忆的童年还与祖母、母亲房间后边那两间阴暗的小储藏室分不开。漫长的冬天，后花园被冰雪封住，储藏室便成了小女孩神秘的乐土。进入里边“探险”是她不能进入后花园时最大的快乐代偿。阴暗的储藏室内堆放着数不清的记载家族兴衰的旧器物。当好奇的小女孩一件件翻出来拿给祖父、祖母看时，不禁勾起两位老人尘封已久的家族往事和对早已出嫁的女儿们的点滴记忆，在怀旧中引发无尽感慨。“这是你大姑在家里边玩的”，“这是你二姑在家时用的”，听着祖父、祖母对一件件旧物的指认，小女孩无意间触摸着一个家族的记忆和关于时光的质感。屋外大雪纷飞，旧物所承载的陈年往事，在萧红的感受中成了遥远的童话，从大姑的扇子、三姑的花鞋上寻找姑姑们闺阁生活的痕迹，触摸家族尘封的记忆。

6岁那年的上街“冒险”是萧红童年难以消抹的“事件”。

皮球脏了、旧了，小女孩便产生拥有新皮球的渴望。祖母已经答应她的央求，但祖母每次从街上回来都让她失望。获得新皮球的渴望，最终驱使从未一个人上街的小女孩偷偷上街做一次探险。她想找到母亲曾经带她买皮球的那家商店，但偷偷出了后角门再往北走不多远便模糊了此前十分清晰的记忆。街道在慌乱中都变成了一个模样，小女孩无助而兴奋地看着街上车来车往。多亏一位好心的车夫问明她的姓氏和父亲的名字，用马拉的斗子车将她送了回来。第

一次坐马拉斗子车同样让小女孩感到无比新鲜，迷路的惊恐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像大人一样坐在车后的长木椅上有一种冒险的快乐。同时，她还想起在祖母房间里所听到的邻居刘三奶奶讲给祖母听的关于乡巴佬蹲洋车的笑话。刘三奶奶那天晚上说，乡巴佬在洋车上始终蹲着不肯坐下，是因为他觉得蹲着没有重量，马不会吃力，车夫就不会收他的钱。小女孩不禁也想试试蹲洋车的滋味，这乡巴佬式的愚蠢坐车方式满足了她的想象，她感到新鲜、刺激。

家里人发现孩子不见了都心急如焚，四处寻找。不久，见被人送了回来，祖父、祖母、母亲一拥而上。大人们紧张而恐慌的表情让蹲洋车的小姑娘真的有些害怕。她原本还要向祖母示范乡巴佬应该是像她那样蹲洋车的。然而，忙乱中，车子的突然停放使她不小心从车斗里摔了下来。孙女的丢失虽只是一场虚惊，祖父却很气恼于萧红小小年纪就敢往外乱跑，又见她从车斗里摔下来，于是将内心的焦灼、气恼与心疼都发泄在车夫身上，上前不由分说给了一记耳光，不仅没有感谢，连车费也没给，就将他赶走了。祖父的举动给了童年萧红莫大的刺激，一向性情温和的祖父同时给了她一个霸道而浅显的道理：“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萧红或许由此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分野，对她来说，慈祥的祖父那虽然充满爱意的过激之举，却让她始终难以释怀，成了深刻的童年记忆。这一事件也让她日后将目光更多投向住在西院的那些“没钱人”，充满同情与关爱而不愿显示自己是个“有钱的孩子”。张秀琢回忆中的姐姐“从不歧视贫苦人，而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由此大家都说她不像有钱人家的姑娘”。作为作家的萧红日后之所以能够塑造出有二伯、冯歪嘴子、王大姑娘、小团圆媳妇等形象，或许亦与这童年时期的“创伤性记忆”不无关联。



萧红出生的炕头（王连喜摄）



后花园里的磨坊（程乾波摄）

萧红关于父母的童年记忆模糊而抽象。父亲是“冷淡”的，母亲则是“恶言恶色”。她对父母的感受显然更多参照于祖父对她的溺爱。实际上，萧红父亲是个虽新还旧的人物，一方面维持传统礼教，略具家长作风，“爷们”做派几乎是东北男人的先天质素，即便在今天亦不曾稍减；另一方面他毕竟是接受了新式教育，受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自然习染了革新思想。呼兰毕竟是个边远小城，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张廷举或许基于固有的男尊女卑思想对萧红表现出冷淡也极有可能。不可忽视的是，接连不断的家庭变故让这位父亲在很长时间可能没有好的心绪，作为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自然无法体察。萧红4岁时大弟富贵不幸夭折，5岁时二弟连贵即张秀珂出生，6岁时祖母病故。张廷举自己就是因为伯父张维祯膝下无子而过继立嗣的，在这个家庭里，男孩的出世和夭折无疑是牵扯家族神经的大事，喜悦和伤痛自然非同一般。祖父对萧红的溺爱，也让张廷举因过继子身份而不敢过多干涉。在这种意义上，“冷淡”或许是作为父亲严厉之爱的表现。亦有呼兰本地学者认为，张廷举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大家闺秀，看不惯她那任性撒野的样子故而冷淡。但在小女孩看来这是父亲对自己的“不爱”。

祖母病重，姑姑们带着家眷回来看望母亲，家里骤然热闹起来。这给萧红带来无边的兴奋，虽然那些天祖父无暇顾及她，但姑姑们带来的孩子却是她在后花园里的新玩伴。一天，她把覆盖酱缸的帽子吃力地顶在头上，这是一种极其新鲜的体验，顶着缸帽子就像随时带着一座不怕风雨的小房子，也随时有了一个小小的家。当她费劲地回到屋内寻找祖父，要告诉他这份新鲜创意的时候，父亲一脚踢翻了她，差点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当她被旁人抱起，看见满屋的缟素，并发现祖母没有睡在炕上而睡在一张长板上时，这才明白她已经死了。祖母的死就这样和父亲的踢打烙印在萧红6岁的记忆里。父亲的体罚无比深刻，而祖母的死却十分淡漠。

一个任性的小女孩对母亲的管教自然看成“恶言恶色”，认为母亲也不爱她。母亲对萧红在祖父母溺爱下的成长充满隐忧。姜玉凤回忆，萧红母亲每年都要带她回娘家一两次，萧红稍大一点，母亲便常对娘家亲人说：“荣华这孩子都让他们（指萧红祖父、祖母）给惯坏了，说话都学着咬舌了，可惯不得了。”四五岁的时候，母亲就十分注重她的文化教育，每次省亲都带着识字的字块。现存的一张萧红3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中，小女孩穿戴整齐利落，衣服质地和母亲一样，十分讲究，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身份。相片中的萧红抿着小嘴显得自

信而灵气，很难想象是那种从小不被父母关爱甚至遭虐待的孩子。

成年后，萧红在其他文章里亦常常谈到父母，如“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许多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据此认为萧红拥有一个极其不幸的童年，根源便是父母之爱的缺失，甚至受到父母和祖母的虐待。这显然是片面而武断的结论。在这些写于萧红与家庭彻底决裂之后的文字里，她对于家庭的仇恨和敌对心态显然左右了对于父母的情感判断，任性而偏执。而在写于40年代初，其弃世前不久的一些文章中，萧红对于父母的童年记忆，在情感态度上就有了明显变化。



萧红三岁时与母亲在一起（张抗提供）

理性而公允地说，萧红的童年是十分幸福的，而祖父母的溺爱不觉中让她养成了任性倔强的性格。这份任性对于她日后悲剧性命运的形成并最终过早客死异乡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人们往往过于采信萧红已然和家庭决裂之后对于家人的谈论，不觉中夸大了她的童年苦难，并由此形成一种认知定式，显然非常荒谬。正如铁峰先生所认为的那样：“说萧红自幼就没有父母之爱、家庭的温暖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据萧红的堂妹张秀珉、堂弟张秀琳等人说，萧红从小就得到家庭的喜爱和娇惯，长大后在他们兄弟姊妹排行中，也被长辈们高看一眼。直到她逃婚后，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家人才仇恨她，憎恶她。”

## 1919，童年的终结

祖母的死，似乎并没有对萧红的童年产生太大影响，在其文字里也很难见到关于这场亲人亡故的伤痛，小女孩的快乐童年一点没被惊扰。

祖父的屋子从此变得空寂。为了和祖父日夜在一起，萧红吵闹着要睡到祖父炕上。没有了范氏的数落，祖父那落寞、孤独的内心自然非6岁的孙女所能体

察。不过，幸好年迈的祖父和小孙女之间又有了新的可以共同参与的游戏，那便是学诗。

张维祯那幼读诗书十余年的中国传统诗歌教育此时派上了用场。他开始教萧红念《千家诗》，无需课本，只是他念一句，小孙女跟着念一句。让一个全然不识字的小女孩学诗，对于祖父来说，在给小孙女进行原始诗教的同时，亦是他排遣内心寂寞的手段。中国古诗那顿挫谐和、琅琅上口的音韵，对于聪明伶俐的小女孩来说，是一种轻易就能掌握、新鲜无比的语言游戏。她的兴致越发浓厚，早晚缠着祖父，甚至半夜醒来仍不忘念诗，常常念困倦了便在余兴中睡去。对此，祖父欣喜异常、乐此不疲。大声“喊诗”是小女孩故意引起全家人注意的一种手段。大人越是制止，她便越发得意，母亲吓唬要揍她，小女孩并不理会，只是祖父怕她喊坏了喉咙，常常警告说：“房盖被你抬走了。”学念新诗时，如果开头一句不是很响亮、顺口，她便说“不学这个”，祖父便赶忙换一首，好在祖父肚子里的诗层出不穷。萧红能够背诵的诗多了，每有客人来，祖父便不无得意地在客人面前夸耀小孙女的聪明、灵秀，让她在客人面前背上一首，满足他那小小的虚荣。

这种不知其义为何的念诗方式并不能令祖父满足。小孙女也常常恶作剧地把诗句自行篡改以便更加顺口。“几度呼童扫不开”被故意念作“西沥忽通扫不开”。小女孩十分得意于自己的篡改，觉得念起来既好听又有趣味。萧红能够背诵一些诗后，祖父便开始给她讲诗。讲《回乡偶书》的时候，祖父给她打比方说：“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离家，回来的时候乡音没有改变但胡子都白了，谁还认识呢？小孩子见了就招呼说：你这个白胡子老头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离家与返乡的故事，经过祖父的讲解，令萧红童稚的心灵感到一丝恐惧，不断地问：“我也要离家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祖父笑着说：“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看见孩子还是一副不高兴的神情，祖父赶紧说：“你不离家的，你哪能够离家……”随即用轻松喜悦的《春晓》打断敏感的小女孩关于“家”的联想与追问。

祖父给予萧红的初始诗教，是她接触文学的第一步，也许这第一步就已然宿命般地要让她日后成为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她在极其有限的创作时间里所留下的最动人的文字，就是关于离家与返乡的故事。只不过，其“离家”是悲剧性的逃离，而“返乡”是精神性的梦回。对她来说，家，离开了，就回不去了！因而，这起始诗教就是那首关于离家与返乡的古诗，之于萧红短促而流徙